

苏轼书法，名列「苏黄米蔡」之首，是北宋「尚意」书风的代表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

苏轼《三马图赞》本是为李公麟《三马图》所作跋赞，绘画、书法本为一卷，

原为清宫旧藏，后流散出官被人撕毁，仅存残卷两段，现藏故宫博物院，鲜为世人知晓。

此卷撕毁前原状如何？李公麟作图以及苏轼作跋赞的背景是什么样的，体现了苏轼哪些思想？

与李公麟传世《五马图》卷又有哪些联系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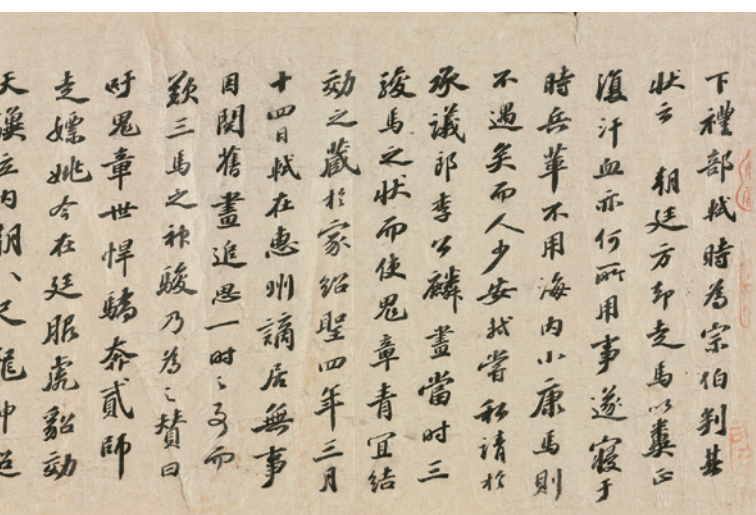
# 八尺龙 神逍遥

## 苏轼《三马图赞》残卷相关问题

### 段莹

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研究馆员，  
主要从事古书画鉴定研究

宋 苏轼 三马图赞残卷（两段）  
纸本墨笔  
故宫博物院藏



故宫博物院藏有苏轼《三马图赞》

残卷两段。该卷原为李公麟《三马图》

及苏轼赞合卷，后有周紫芝、俞希鲁、

董其昌、张丑等宋元明诸家跋，流出清

宫后被撕毁。故宫博物院所藏两段，第

一段于一九六四年收购自荣宝斋，宽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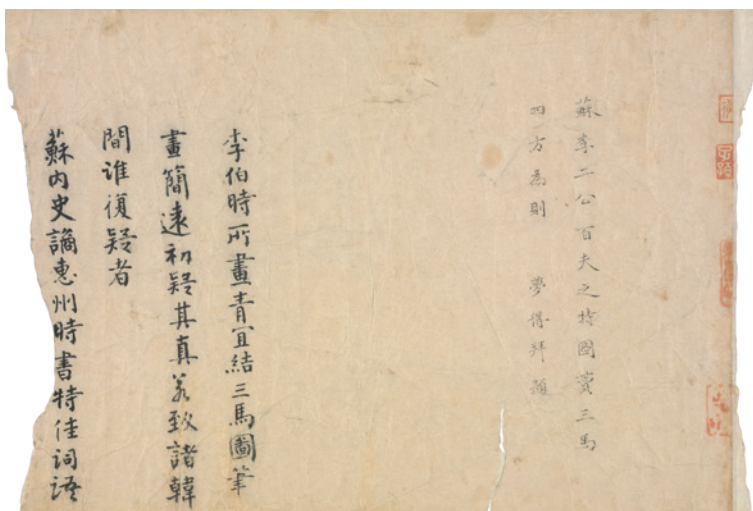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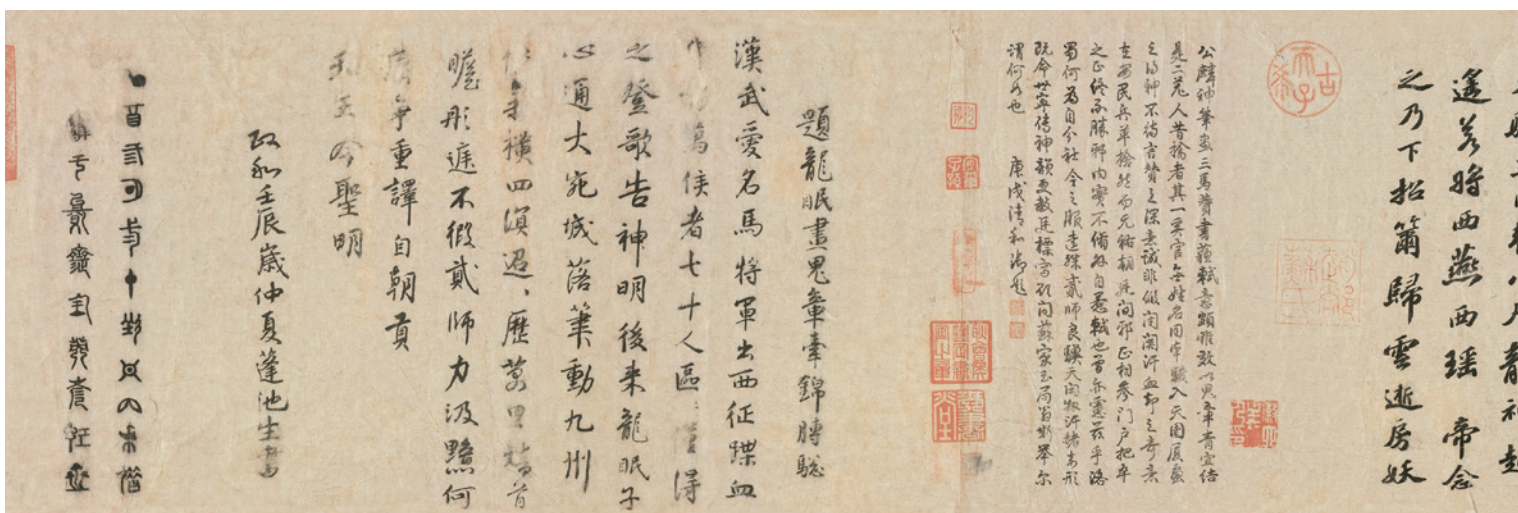
十九点二厘米，长七十八点六厘米，仅

余苏轼赞后半部分（自「下礼部轼」起十六行）

及乾隆御题、蓬池生、任英彦、周紫芝、

王震题跋观款。王震跋仅余「右龙眠居

士李伯时画三马图，东坡先生赞之。伯



時」兩行，后被撕去，故宮博物院收入時記錄云：「前缺，后王震跋二行，以后缺。清乾隆時重裱，裱后被撕破，通身有皺紋。」徐邦達先生鑑定称其「书法精美，定为一级乙」。而未见于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著录，不知何故。第二段调拨自文物局一九五七年收购，为张梦得观款及王纬跋。王纬跋仅余「李伯时所画」至「书特佳，词语」四行，后亦不存。

苏轼赞作于绍圣四年（二〇九七年），时东坡年六十二岁。赞以行楷书写成。苏轼书法与此时时间相近者，有作于元符三年（一一〇〇年，苏轼六十五岁）的《渡海帖》《民师帖》，以及作于卒年（建中靖国元年，一一〇一年）的《江上帖》。三帖均以行书写成，笔势苍劲浑厚。此卷书法略近于《民师帖》，而更显收束。苏轼楷书真迹，见于《前赤壁赋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、《祭黄几道文》（上海博物馆藏）等，可与此帖互相参看。书后有「赵郡苏轼」阳文印，约五厘米见方，该印亦见于苏轼《祷雨帖》（现藏地未知），尺寸之大，在宋人私印中亦属稀见。



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  
不遇矣而人少安哉嘗私請於  
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  
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  
効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  
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



因閱舊畫追思一時之馬而  
歎三馬之神駿乃為之贊曰  
吁鬼章世悍騎奔貳師  
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効  
天驤立內朝八尺龍神超  
遙若將西燕西瑤帝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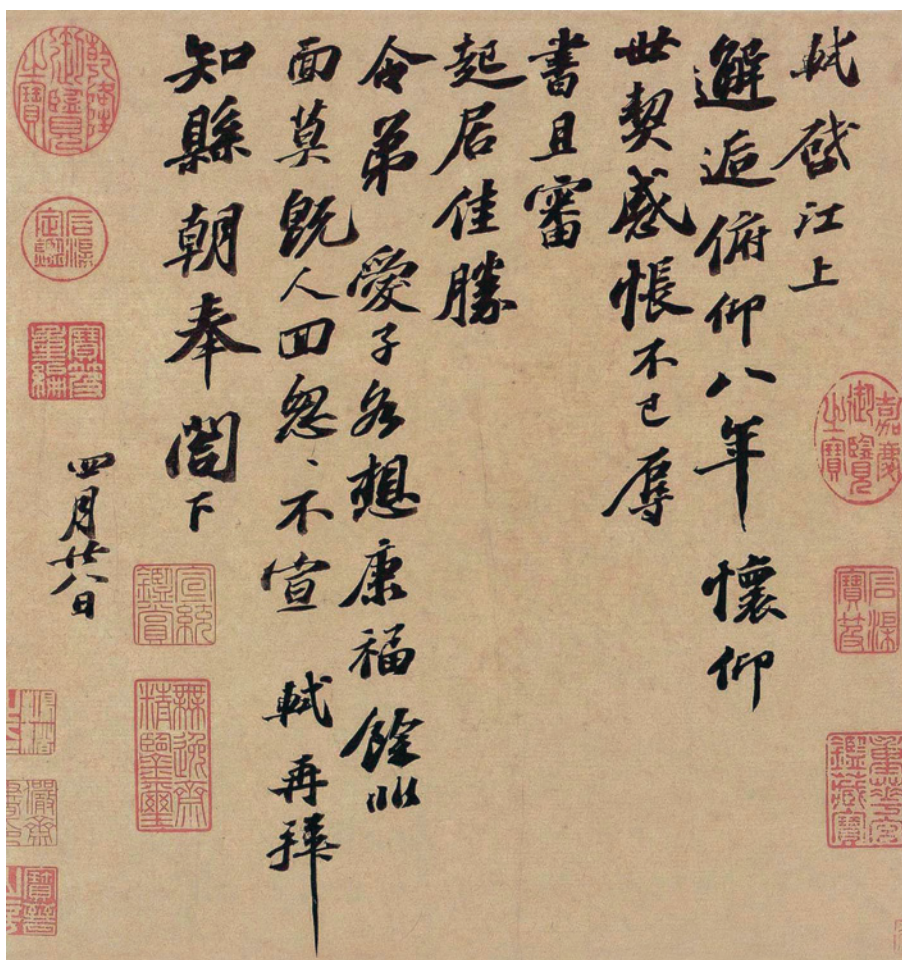


此將渡海宿澄邁承  
 令子見訪知  
 淫者未歸又云恐已到桂府  
 若果尔庶幾得於海康  
 相遇不尔則未如  
 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  
 晚景宜  
 倍萬自愛耳 恕不復此希  
 今子書更不重封  
 此  
 夢得祗接閣下  
 六月十三日  
 夢得祗接  
 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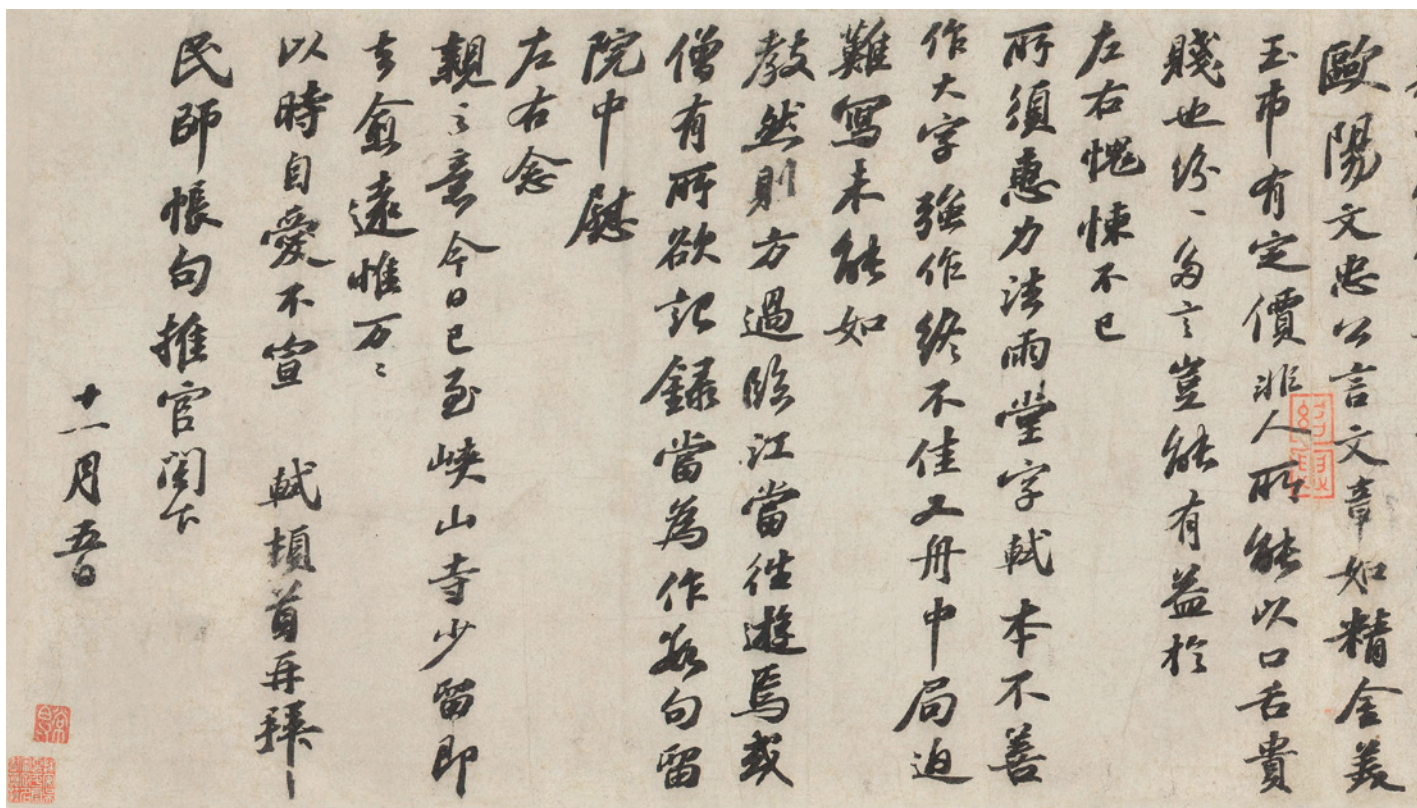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是文之意疑為不然求物之  
 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  
 於心者蓋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  
 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詞  
 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  
 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  
 易之說為正言之則人之知之此正  
 所謂調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  
 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  
 身調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  
 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  
 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 
 可以其似賦而謂之調蟲乎使賈  
 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  
 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  
 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  
 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



宋 苏轼 渡海帖  
纸本墨笔 纵二八·六厘米 横四〇·二厘米  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

宋 苏轼 江上帖  
纸本墨笔 纵三〇·三厘米 横三〇·五厘米  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

宋 苏轼 民师帖  
纸本墨笔 帖心纵二七厘米 横九六·五厘米  
上海博物馆藏



## 从著录看此卷的完整面貌

该卷经《石渠宝笈续编·乾清宫》

著录，可知其完整面貌为何。《石渠宝笈续编》云：

本幅澄心堂纸本，纵九寸一分，横八尺九寸二分，白描效马者三人，各鞍一，无名款。后苏轼行书：「元祐初，上方闭玉门关，谢遣诸将，太师文彦博、宰相吕大防，范纯仁，起诸生游师雄行边飭武备。师雄至熙河，蕃官包顺，请以所部熟户除边患，师雄许之。遂擒猾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以献。百官皆贺，且遣使告永裕陵。时西域贡马，首高八尺，龙颅而凤膺，虎脊而豹章。出东华门，入天驷监，振鬣长鸣，万马皆瘖。父老纵观，以为未始见也。然上方恭默思道，八骏在庭，未尝一顾，其后圉人起居不以时，马有毙者，上亦不问。来年，羌温溪心有良马，不敢进。请于边吏，愿以献太师潞国公，诏许之。蒋之奇为熙河帅，西蕃有贡骏马汗血者，有司以为非入贡岁月，留其使与马于边。之奇为请，乞不以时入。事下礼部，轼时为宗

伯，判其状云：「朝廷方却走马以粪，正复汗血，亦何所用。事遂寝。于时兵革不用，海内小康，马则不遇矣，而人少安。轼尝私请于承议郎李公麟，画当时三骏马之状，而使鬼章青宜结效之，藏于家。绍圣四年三月十四日，轼在惠州，谪居无事，因阅旧画，追思一时之事，而叹三马之神骏，乃为之赞曰：吁鬼章，世悍骄。奔贰师，走嫖姚。今在廷，服虎貂。效天骥，立内朝。八尺龙，神超遥。若将西，燕西瑶。帝念之，乃下招。箭归云，逝房妖。」钤印一：赵郡苏氏。

由此可知苏轼赞全文内容。后录乾隆御题及诸家跋，可知跋者有：蓬池生、任英彦、周紫芝、王震、张梦得、王纬、兀颜子敬、杨椿、俞希鲁、董其昌（二跋）、张丑。现王震、王纬跋后段及兀颜子敬以下跋皆不存。诸家跋语俱见《石渠宝笈续编》著录，不移录。《石渠宝笈续编》对此赞与跋者进行了校订考证，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，兹转引如下：

谨按苏轼赞见本集，赞中「起诸生」作「建遣诸生」，「来年」作「明年」，「旧画」作「旧书画」。「西瑶」作「昆





瑶」。是迹见《清河书画舫》，题跋正同。且考云：李伯时《三马图》，苏轼赞，宋元跋者九人。紫芝道人姓周氏，字少隐，所著有《竹坡诗话》。王震乃鞏之侄，东坡有用王鞏韵送其侄震知蔡州诗。震大观间人。尝叙郭氏山水训纂。梦得张姓，即东坡为撰郭忠恕画赞者，非石林也。子寿即杨椿之字，本蜀人，流寓吴中。又见《书画汇考》，题跋亦俱吻合。又见《南阳名画表》，张丑《秘篋书画表》。

## 对苏轼题赞思想的理解

东坡此卷题赞文字最早见于《宋文鉴》。《宋文鉴》为南宋吕祖谦所编，卷七十五收录《三马图赞》，内容与书迹一致。（吕祖谦《宋文鉴》卷七十五，四部丛刊景宋刊本）又宋王应麟编《玉海》，「马政」部分有「元祐三马图」，为《三马图赞》之节录。（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一百四十九，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刊本）这些著录从文献层面证实了文本内容的可靠性。

据苏轼题赞，此画的创作背景是元祐初朝廷擒鬼章（即青宜结鬼章，北宋时期

### 阅读链接

#### 元祐初年宋军生擒鬼章事件

◎ 元祐二年，青唐吐蕃唃廝囉政权首领阿里骨与西夏政权联合进攻北宋。宋哲宗派名将游师雄仅出兵四天就生擒青唐吐蕃大将青宜结鬼章，收复洮州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鬼章被擒之后，槛送京师问罪，朝廷上下对这一战绩非常满意，当时的文学大家如苏轼、晁咏之等人，皆有以擒鬼章为题材的文章。但在如何处置鬼章的问题上，朝廷上下却各执己见。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应该放还鬼章，宰相范纯仁则坚持认为应该诛杀鬼章。最终，宋朝廷决定不杀鬼章，赦免其罪状，还对其进行封赏。此后，阿里骨政权内部矛盾加剧，不得不放弃依夏抗宋的政策，向北宋求和。

青唐吐蕃首领唃廝囉手下将领）之事。《宋

史》载：「（元祐二年）八月……丁未，岷州行营将种谊复洮州，执蕃酋鬼章青宜结……十一月……庚申，赦鬼章于崇政殿，以罪当死，听招其子及部属归以自赎。」（脱脱等撰《宋史》卷十七，中华书局，

一九七七年，第三二五页）当时西域又进贡良马，而哲宗不以为意，马有毙者。时隔多年，苏轼私请李公麟画当时三贡马



宋 李公麟 临韦偃牧放图卷

绢本设色 纵四六·二厘米 横四二九·八厘米  
故宫博物院藏







之状，使鬼章青宜结牵之。

那么，苏轼为什么要请李公麟画这样一幅作品呢？联系新旧党争背景下神宗、哲宗二朝对西北边事立场的变化，以及苏轼身处党争中对西北边事问题思考的变化，便不难窥见苏轼请李公麟作《三马图》的原因。

西夏、吐蕃，北宋时皆被作为番邦属国。朝廷虽屡有封赏，但侵扰不断，而宋初以来诸帝基本以求和为主。对西夏，太宗时即赐大量金银钱帛。真宗时，割河西银、夏等五州与之，颁赐无数。仁宗时与西夏交战，两败俱伤，西夏上表要求划定疆界，「**凡岁赐银、绮、绢、茶二十五万五千，乞如常数**」。（脱脱等撰《宋史》卷二百四十四「外国一·夏国上」）英宗时，也基本采取且战且和的策略。对于吐蕃也是如此，以岁赐来稳定边境，避免交战，已经成为一种主要手段。

神宗即位后，起用王安石，推行新政。在边事问题上，一变前朝的主和思想，对西北边事采取激进的态度。王安石变法的兵制改革，增强了边境兵力，为征伐西北提供了有力支持。神宗朝与西夏交战数十次，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前代，

且其中不乏主动出击。尽管多次交战，双方两败俱伤，消耗国力，但战事不减。王安石所言「**奋张天兵，开斥王土**」（王安石《百寮贺复熙河路表》，《临川集》卷五十五，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），正是代表了新党执政下神宗朝对西北边事的主战激进态度。

哲宗即位时年龄尚幼，由宣仁太后高氏当政，起用司马光等旧党成员，朝廷对西北边事又回归主和方向。司马光对边事一向主张求和，元祐元年（一〇八九）上《论西夏札子》，对神宗朝的征伐予以批评，认为激化了对外矛盾。他主张朝廷以怀柔推恩政策笼络西夏，取得边疆安定。（司马光《温国文正公文集》卷五十，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）司马光去世后，旧党成员在边境问题上延续了主和的主张。如文彦博元祐元年《答奏》云：「臣以为方国家多事，务早安静。奏乞朝廷恢海天之量，广示开纳。御四夷之术，羁縻而已。由此可以息兵止固，吾国外夷怀服，中夏安宁，则太平之风浸隆浸久。」（文彦博《潞公集》卷二十七，明嘉靖五年刻本）刘摯元祐初上《论应西夏奏》，亦反对神宗朝的穷兵黩武，

强调应归还侵地，恢复岁赐，以弭患息争，与民休息。（刘摯《忠肃集》卷六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）在旧党的倡导下，元祐时期至哲宗亲政前，朝廷对西北边事基本持主和态度。元丰八年（一〇八五年）哲宗即位后，接受西夏使臣及朝贡，其后与夏国通使往来，主和之意甚明。元祐四年，与夏人通好，诏边将毋生事。元祐五年四月，夏人来议分画疆界。之后，朝廷对西夏的侵扰不再主动出击。其后面面对西夏的多次侵扰，朝廷均以守御为主。这都是由旧党主和安边的态度所决定的。

对于身处党争中的苏轼而言，他对于西北边事的看法自神宗至哲宗朝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。神宗执政时期，苏轼身为旧党成员，对朝廷在军事上的激进并不赞同。他作于熙宁十年（一〇七七年）的《代张方平谏用兵书》云：

臣闻好兵犹好色也。伤生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必死。贼民之事非一，而好兵者必亡。此理之必然者也……是以圣人计胜负之功，而深戒用兵之祸。（苏轼《苏文忠公全集·东坡奏议》卷十五，明成化本）

《代滕甫论西夏书》亦云：「因悟



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，皆是医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。其势亦未必不成。然终非臣子深爱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。」

（苏轼《苏文忠公全集·东坡奏议》卷十五，明成化本）这些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观点，就是反对过度用兵。在苏轼看来，过度好兵不仅导致边患，而且也增长了武臣的贪功用心，于朝政不利。这些观点自然是指向王安石一派新党的改革兵制、力主征伐的主张。

而在哲宗朝，以司马光、文彦博为代表的旧党对西北采取主和的态度，这一转变再次引起苏轼的质疑。苏轼虽不赞同神宗朝新党力主征伐的做法，但对旧党上台后的一味求和也持否定态度。在作于元祐二年九月的《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》中，他由擒鬼章一事，引申到对西北边境的政策。苏轼认为神宗时虽与西夏交战累年，导致国力疲敝，但也使西夏损失惨重，不得不主动与宋修好。而执政大臣未及深谋远虑，接纳其使臣，赐与大量绢帛，又使西夏恢复国力，察觉宋朝厌兵欲和之意，从而觊觎中原。若继续纳使求和，必将后患无穷。在这里，苏轼对哲宗「意在息民，

不惮屈己」的态度提出异议，反对朝廷一味求和退让，认为「开之太易，纳之太速，曾未一战，而厌兵欲和之意已见乎外，此复蹈前日之失矣」，「为国不可以生事，亦不可以畏事。畏事之弊，与生事均」。 （苏轼《苏文忠公全集·东坡奏议》卷五，明成化本）哲宗其时并未亲政，苏轼的谏议，其实是指向旧党力求和政治倾向。可以看到，虽同为旧党成员，但苏轼对旧党的一味主和也是不认同的，在战与和之间，他选择了更为折中的态度：

臣闻善用兵者先服其心，次屈其力，则兵易解而功易成。若不服其心，惟力是恃，则战胜而寇愈深，况不胜乎？功成而兵不解，况不成乎？（《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》，《苏文忠公全集·东坡奏议》卷五，明成化本）

但使吾兵练士饱，斥候精明，彼无大获，不过数年，必自折困，今虽小劳，后必坚定，此臣所谓当今待敌之要，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。（《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》，《苏文忠公全集·东坡奏议》卷五，明成化本）

这反映出他对于边事和战争问题的

总体认识。乾隆皇帝跋言：「然而元祐朝廷间，邪正相参门户把。卒之正终不胜邪，内实不修外自惹。轼也曾亦虑兹乎，洛蜀何为自分社。」道出了党争背景下苏轼对西北边事的独立判断和思考。

苏轼请李公麟画《三马图》，是以元祐二年八月擒鬼章事为背景。这一事件也是苏轼对神宗、哲宗二朝新旧党争背景下西北政策思考转变的开端。苏轼对于朝廷擒鬼章一事的态度，在他元祐二年八月至十月间所作《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》《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》《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》《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》等都有所体现。苏轼在其中寄予了很多的思考，具体到对鬼章事的处理，包括擒获鬼章之后不应称贺太速、恩赏太过，以加重边将居功自傲之心；以及针对朝臣提出应将所擒鬼章首领作为人质，牵制其部族的看法而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鬼章老病垂死，若死，其子孙为复仇必与阿里骨（青唐吐蕃唃廝囉政权第三代统治者）及西夏联合，进攻中原。不如与鬼章部族约谈，令其讨伐阿里骨、擒赵纯忠（青唐吐蕃首领唃廝囉三子董毡的族子，是阿里骨首



公麟神筆畫三馬贊書蘇軾意頗雅致以鬼章青宜結  
 是二羌人昔擒者其一奚官無姓名同牽駿入天圉展畫  
 之曰神不待言贊之深意誠非假用閑汗血而之奇素  
 在安民兵革擒然而元祐朝廷問邪正相參門戶把卒  
 之正終不勝邪內實不備外自惹軾也曾年憲茲乎洛  
 蜀何為自分社今之服遠殊貳師良驥天閑牧汗緒高飛  
 既今世寧傳神額更教廷標宮石問蘇家玉局翁斯舉尔  
 謂何如也 康成清和張起

《三马图赞》残卷后乾隆皇帝跋

领之位的有力竞争者），则可放还鬼章首领，这样令其彼此相攻，宋则为受益者，等等。而这些思考背后，指向的是西北边事大局的宏观认识。

在《三马图赞》中，苏轼言「上方

恭默思道，八骏在庭，未尝一顾」，又云：「事下礼部，轼时为宗伯，判其状

云：朝廷方却走马以粪，正复汗血，亦何所用。」「却走马以粪」出自《道德

经》，意指天下有道，将战马用来耕地。

又云「于时兵革不用，海内小康，马则

不遇矣，而人少安」，似是对哲宗朝不

轻易用兵的肯定，然而联系苏轼对于西

北边事的认识和对哲宗朝旧党执政下主

和思想的态度，便可见出其中的隐微之

意。苏轼请李公麟画《三马图》，应是

针对旧党的主和倾向，其中深意还是借

西域贡马和擒鬼章之捷，旨在彰显天朝

威仪，呼吁朝廷不当一味屈己求和，而

应恩威并施，令西北臣服。这应是创作

《三马图》的寓意所在。





## 《三马图》与《五马图》的关系

《三马图》书画合卷，目前仅余苏轼题赞残卷。李公麟传世真迹有《五马图》，二画皆以西域贡马为题材，都作于元祐年间，那么，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？首先要从二图的创作时间说起。

《五马图》的创作在元祐五年之前。曾纮跋云：“余元祐庚午（元祐五年，一〇九〇年）岁，以方开科，应诏来京师，见鲁直九丈于黼池寺。鲁直方为张仲谏笈题李伯时画天马图，鲁直谓余曰：‘异哉！伯时貌天厩满川花，放笔而马殂矣。盖神骏精魄，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。实古今异事，当作数语记之。’而苏轼请李公麟作《三马图》，应在元祐七年（一〇九二年）、八年（一〇九三年）间。其题赞云「事下礼部，轼时为宗伯」，之后请李公麟作画。而苏轼出任礼部尚书是在元祐七年、八年间。由此可知，李公麟先画有《五马图》，后应苏轼之请画《三马图》。

《宣和画谱》称李公麟「尝写骐驎院御马，如西于阗所贡，好头赤、锦膊骢之类，写貌至多。至国人忌请恐并

神物取去，由是先以画马得名」。则苏轼应是因李公麟多画贡马，故而请李公麟为自己再作之。苏轼关于李公麟的马画有不少诗作，其集中有《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》，「好头赤」亦李伯时（李公麟，字伯时）所绘五马之一，可见其对李公麟马画的熟悉。《云烟过眼录》载：“伯时《天马图》，笔意飞动，有王晋卿、苏子瞻和诗在后。”（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上，商务印书馆，一九三九年，第二三页）苏集中即有《和王晋卿题李伯时画马》，又有《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》云：“忽见伯时画天马，朔风胡沙生落锥。天马西来从西极，势与

阅读链接

### 李公麟画马

◎ 李伯时善画马，法秀师让之曰：“伯时为士大夫而以画行，已可耻，又作马，忍为之耶？”伯时恚曰：“作马能荡人心坠恶道乎？”师曰：“公业已习此，则日夕思其情状为神骏，系念不忘，一日眼花落地，必入马胎无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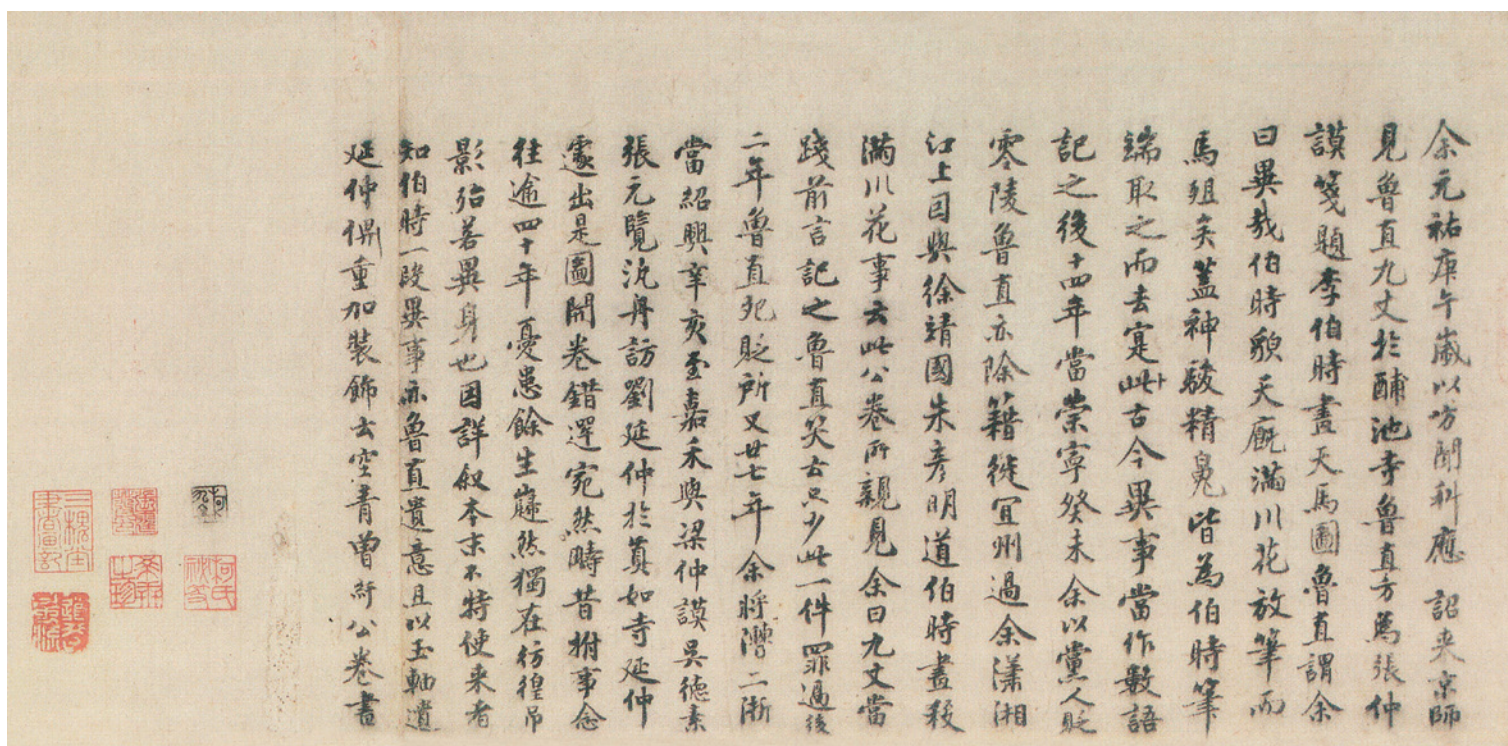
◎ 李伯时画天厩满川花，放笔而马殂矣。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去。

——丁传靖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十三





宋 李公麟 五马图卷（文物旧照）  
纸本设色 纵二九·三厘米 横二二五厘米  
原图藏东京国立博物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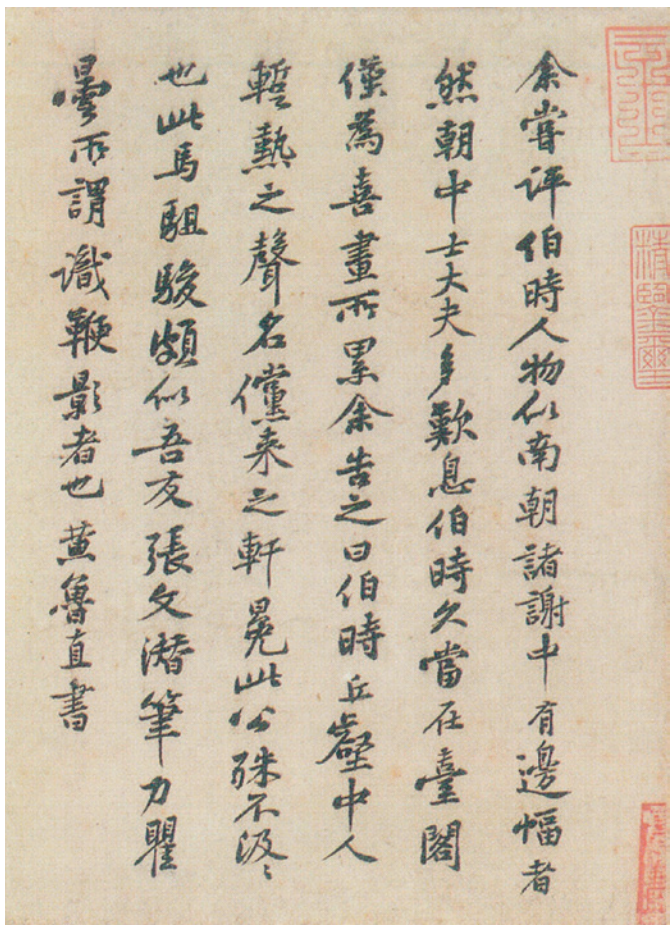
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卷局部之曾纡跋



落日争分驰。龙膺豹股头八尺，奋迅不受人间羁。元狩虎脊聊可友，开元玉花何足奇。」（苏轼著，冯应榴辑注《苏轼诗集合注》卷二十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，

第一四二〇页）认为韩幹「画肉不画骨」，不及伯时，对李公麟画马给予很高评价。这成为苏轼请李公麟作《三马图》的一个基础。

关于《三马图》的面貌，《墨缘汇观》称其「淡设色」，《石渠宝笈续编》云「白描效马者三人，各鞍一」，即三人控三马。苏轼自言：「轼尝私请于承议郎李公麟，画当时三骏马之状，而使鬼章青宜结效之。」乾隆御题称：「效奚官无姓名，同牵骏入天圉廐。」由此可知，牵马者有鬼章青宜结及一羌人，另有一不具名奚官（职司养马的官员）。至于三马为何马，卷后蓬池生跋曰「题龙眠画鬼章牵锦膊骢」，则知其中一马为锦膊骢，由鬼章青宜结牵之。李公麟《五马图》中，其中一马即为锦膊骢，黄庭坚题云：「右一匹：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骊驥院收董毡进到锦膊骢，八岁四尺六寸。」与《三马图》中所绘锦



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卷局部之黄庭坚跋

膊骢应为同一马，而牵马者应非鬼章青宜结。据苏轼《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》言鬼章「老病垂死」，而《五马图》所绘牵马者与「老病」之态不符，可知《五马图》中奚官形象应非取自鬼章青宜结。

《五马图》中又有一马照夜白，黄庭坚题云：「元祐三年闰月十九日，温溪心进照夜白。」苏轼赞云：「来年，羌温溪心有良马，不敢进。请于边吏，愿以馈太师潞国公，诏许之。」温溪心（吐

蕃首领，与青唐主董毡、阿里骨不协而附宋。元丰三年遭阿里骨杀害）馈于文彦博者，不知是否为此马。

李公麟画《五马图》，应为摹写形貌，旨在彰显天威，此外应没有隐含的讽喻之意。黄庭坚跋云：「余尝评伯时人物，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，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，仅为喜画所累。余告之曰：伯时丘壑中人，黠热之声名，倪来之轩冕，此公殊不汲汲也。」仅对李公麟的人物品格进行点评，



也并未涉及政治。

而《三马图》的创作，是苏轼借李公麟之手对西域贡马题材进行了发挥。苏轼集中有《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》：

山西战马饥无肉，夜嚼长秸如嚼竹。  
蹄间三丈是徐行，不信天山有坑谷。岂  
如厩马好头赤，立仗归来卧斜日。莫教  
优孟卜葬地，厚衣薪樗入铜历。

优孟卜葬，出自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，楚庄王有爱马病肥死，欲以大夫礼葬之，优孟讽谏，言大夫礼薄，应以人君礼葬，庄王悔悟，遂从优孟请，入铜历（鬲）烹之，葬之人肠腹。这里借马病肥死的典故，隐微传达出对朝廷一味求和的讽谏，与《三马图》题赞的思想是一致的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轼在李公麟《五马图》基础上，试图借贡马喻边事的整体构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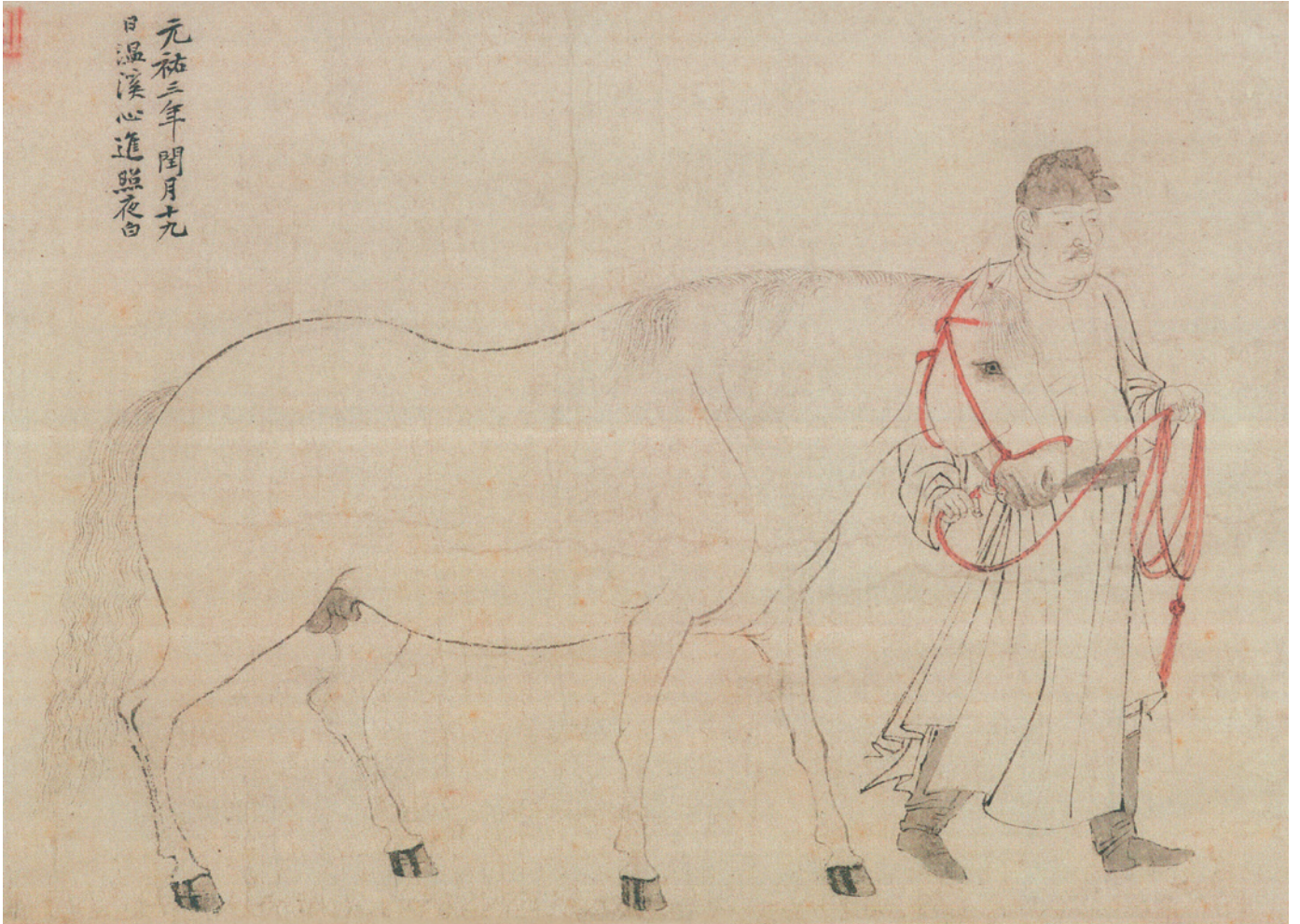
李公麟《三马图》、苏轼题赞书画合璧卷，虽仅见苏轼赞残卷，但此卷对文献的印证，包括对于苏轼晚年书法的研究，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。可惜此画与东坡题赞前半段已散落，唯有藉残卷与御府著录，想象李公麟、苏轼书画合璧的原貌风神。

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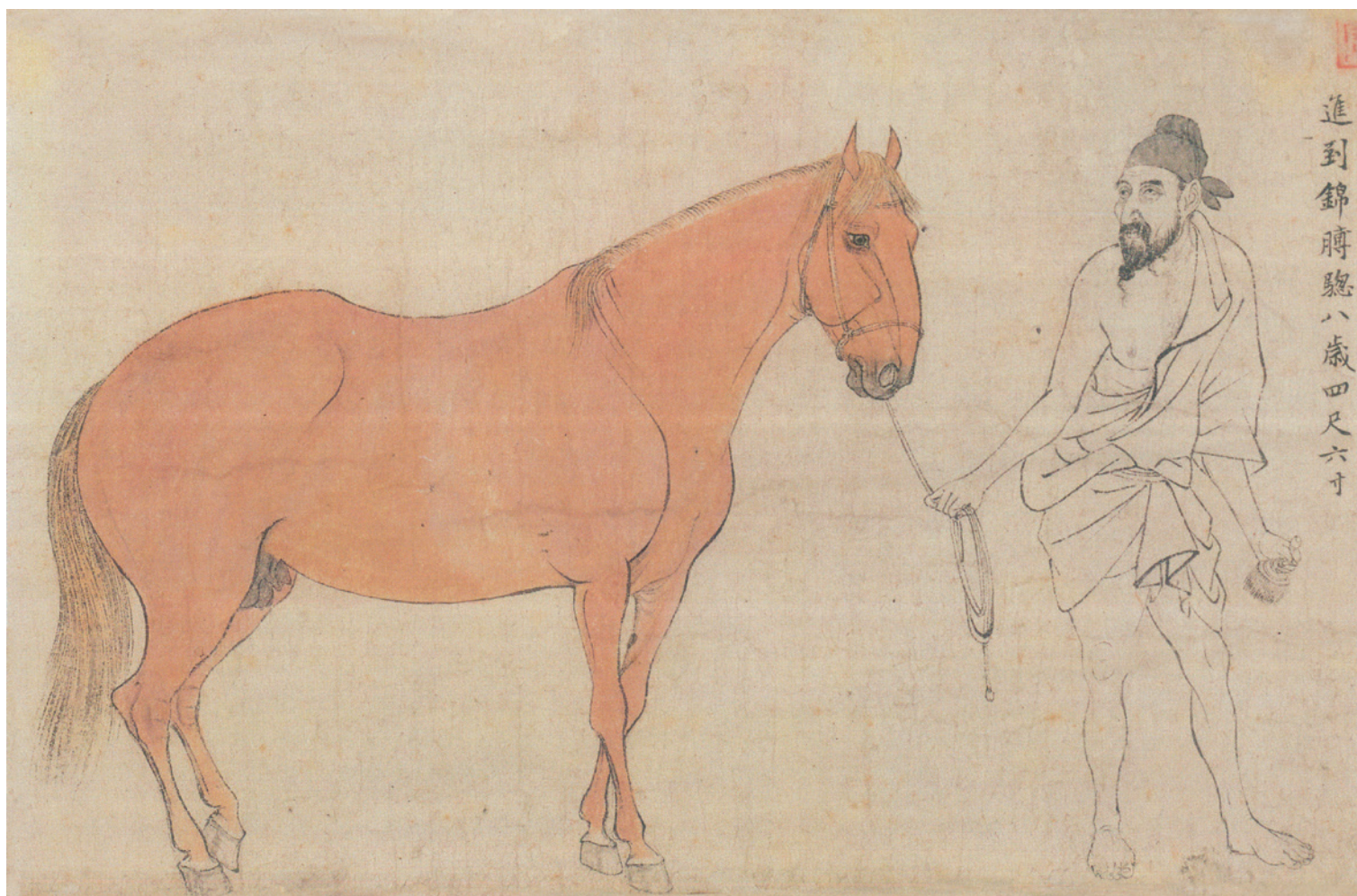
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卷局部之锦膊驄





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卷局部之照夜白





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卷局部之好头赤